



十年知青,七次考试

□汪泰

又到考试季。看着准备小考、中考和高考的学子,几分羡慕几分祝福。也不由想起十年插队期间几次考试的经历,那是从16到25岁的事。

第一次在我们下乡半年后的1969年6月,三垛中学高中部招生,对象是初中插队知青和回乡青年。听到消息,我到公社报了名,一起报名的还有同组的两位同学。下乡劳动了几个月,我们对能再走进学校读书充满渴望,对这次考试充满期待。

考试地点在三垛中学,上午数学,下午语文。印象深的是考数学,试卷发下来,浏览一遍,大部分不会。除了简单的方程、方程组、因式分解以外,都没学过。六八届初中生,进校一年不到,运动开始,在学校闲逛了两年,以初中生的名义毕了业,不会做,应该。我胡写乱答,硬着头皮交卷,然后在操场上就着水泥乒乓球台填了一张表(还被同学挤兑,家庭出身要填祖父的)。下午考试结束,被告之听消息。若干天后,一人录取,一人备取,没我的事儿。没被录取我有心理准备,那是个唯血统论的年代,考试成绩,不重要。虽说有心理准备,但面对有人能上学、有人不能上的现实,心里还是很难受。这次考试给我的感受是:我只是一个没有知识知识青年,识字而已。这次考试,激起了我要自学初中数理化的欲求。

第二次考试是1973年春夏,由基层推荐青年进各级学校,称之为工农兵学员。高邮师范在停办十多年后第一次恢复招生。外地高校招生,我没奢望;高邮师范招生,名额多,有想法。我去公社报名,公社要求必须有大队、生产队的推荐材料,有贫下中农代表座谈会的会议记录,大队领导班子的会议记录等等。我回来找大队支书,支书说,要大忙了,哪有时间开会呢,你自己写材料吧,找人盖个章就行。于是我买了两包香烟,找了生产队的几位干部和老乡,告诉他们推荐上学的事。他们都说不行,你写,我们捺手印。

会没开,记录是造假,但材料是认真写的。写的过程,也是对自

己下乡以来的小结。这一结,还觉得自己真不错,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力所能及帮社员做好事,认真学习做各种农活。最后拿着一摞纸,找人摁手印、盖公章。把所有材料上交后,长出了一口气,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

每晚,我竖起耳朵听喇叭里有无推荐上学名单的广播。终于等到了公布最终名单的一刻,我的心拎了起来。然而希望越大,失望愈大,名单无我。

尽管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考查,我也把它看作是考试。当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成为必要条件时,审查就成了对人性的摧残,它剥去了人最后的一点自信,撕去了最后的一点自尊。但我还是相信,只要劳动表现好,面包会有,牛奶也会有。

在农村,画画是我的爱好。1974年春,南艺和南师美术系招生,传达知青,我又报了名,这次是先初试后复试再政审。初试在三垛文化站进行。一个下午,我带着必需的工具来到三垛文化站。初试是用铅笔临摹一幅宣传画上的工人形象,这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每人一个画板夹张画纸。我坐下,定神,动笔。打轮廓,画阴影,修正,定稿。画好,交卷。负责初试点工作的是县文教局的一位干部,他与我爸爸同过事,我跟他打探这次招生的事。他回答我说,画要集中上去再选人复试。

在希望中等待,在等待中希望。过去了一周,没有消息,又过去了一周,还是没有消息。我到公社文化站打听,文化站侯站长帮我打电话到县文化馆问情况。文化馆说,复试已结束。这才知道上高校学美术的梦破灭了。

劳动中,又迎来了我的第四次考试,这已是1975年的六七月了,我已在大队一个教学点代课。那次面试是一次最基层的面试,放在了政审前。负责面试的是公社文教负责人朱校长。面试在一个星期天,我面对朱校长和另两位文教干部坐下,等待发问。闲话几句后,朱校长问:“文艺创作中的三突出是哪三突出?”“三突出”是当时文艺创作的经典口号,运动已多

年,可我却竟然就说不出来哪三突出。于是,面试结束。

这是考试吗?当然是!

第五次考试是1976年春夏,全部过程已然没有记忆,只留下让我心寒的一句话。屡考不中,我对报名上学已失去热情,只是心有不甘。当时的政治审查照例很严格,由公社组织专人进行。政审结束,公社宣布上报的名单中依然无我。有没有我,我已不以为意。事后没几天,搞材料的当事人来我所在的学校有事,看到我,对我说:你呀,上学这条路以后就不要走了。我懂这句话的内涵,没有说什么,点了点头。

1977年秋,国家恢复高考和相应的中等专业学校招考,明确宣布政审注重考生个人表现,不再和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挂钩。这是运动十年后的第一次公平公正的选拔考试,由于报名人数多,实行了预考。预考由各县市统一试卷,各乡镇组织考试。我过了预考,然而在正式考试时,由于紧张,第六次考试又与上学失之交臂,但我的心却充满希望。我白天继续教学,和学生疯在一起。晚上,煤油灯下,改作业,备课,复习看书,12点以后才上床休息。我向着下一年的考试努力。

1978年7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考试开始了。我的知识基础使我只能报考师范类。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高邮师范、泰兴师范和扬州师范。这次中专没有预考,考试在三垛中学进行。考试时间7月31日,作文题是:八一前夕想亲人。无巧不成书,考试前夜,在三垛招待所住宿,睡前无事,在走廊报栏看报,报纸上刊登的是有关建军节的纪念文章。无意的阅读,成就了我的作文,阅读的信息成了我写作的素材。“从三大起义到三大战役,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作文考试感觉很好,政治、数学、理化都还可以。成绩公布,初中考生录取线240分,高中考生280分,我过高中考生分数线三十多分,被高邮师范录取。这是我知青生涯中的第七次考试。从此,我走上了教师之路。

三次培训

□王鸿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参加过多次培训,其中2015年至2017年在市委编办工作期间,接连参加的三次培训,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不仅层次高,而且非常及时,对当时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全国新任编办主任培训。

2015年5月12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提出了“放权、监管、服务”改革的概念,这对激活市场活力、维护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提高行政效率、转变政府职能意义特别重大。这一重大改革,中央编办被赋予牵头重任,时任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形容:编办工作“从后台走到了前台”。

为适应“放管服”改革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2015年5月底,中央编办专门在苏州培训基地,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新任编办主任培训班,为期一周,来自全国省市县三级120多名新任编办主任参加。我也是编办的一名新兵,正巧赶上了这次培训,确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熟悉、了解、学习业务的好机会。

培训班围绕“放管服”改革、行

政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执法队伍综合改革等主题,时任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相关司长和江苏省委编办主任俞军授课,还到苏州工业园区参观改革现场、听取经验介绍。大家都感到这次培训非常及时、很有必要。

全省编办干部全员培训。

2015年6月,江苏省委编办在南京举办了全省编办干部全员培训,共分三期,一期三天,每期均由一名主任或副主任带队。培训覆盖编办全体人员,这在编办系统尚属首次,这也说明省委省政府推进改革力度、决心之大。时任省委编办主任俞军讲话动员,省委编办有关副主任、处长围绕“放管服”改革及各处工作职责等分别讲课,课上大屏幕仔细讲解,课下热情互动,帮助市县区编办同志释疑解惑,使之形成共识、上下齐心、步调一致,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江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这次培训,为紧张有序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和正在进行的工

商、质监、药监“三局合一”执法改革,及即将开展的纪委监委体制改革、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等,奠定了基础。

全省部分编办主任培训。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探索成立行政审批局,实行一站式服务、不见面审批,一枚公审管审批、一份清单管边界,两公开一随机、“3550”审批流程优化等一系列改革新举应运而生,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也随之而来,迫切需要找到解决新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2016年7月,江苏省委编办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办了全省部分市市区编办主任培训班,为期五天,扬州、邗江、高邮编办主任应邀参加。时任江苏省委编办主任俞军进行动员,国家行政学院有关教授、中央编办有关司长授课。除讲授理论知识外,每个课题专门安排分组讨论,就“放管服”改革中出现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结合工作实际实践,发动学员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广泛探讨,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次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大家进一步厘清了工作思路,坚定了迎难而上、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决心,增强了正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信心。

心里有条行走的运河

□王焕其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大运河还是在1983年4月。村里办羊毛衫厂,我是筹办组成员之一,乡工业公司安排我去扬州,参加扬州市乡镇企业局举办的日本兄弟牌针织横机技术培训班学习。我那时刚刚17岁,最远只到过邻县的兴化城。因为从我的家乡川青乘帮船走水路两个小时不到就到兴化城了,坐汽车到兴化只要半个多小时,而从川青坐汽车到高邮则要两个小时,所以高邮一次都没有去过,扬州更是梦境里去过。那次去扬州学习,我记得是从高邮运河堤汽车站乘班车去扬州城的,因而第一次见到了大运河。

早春的运河堤上,生机盎然,路边高大的柳树抖开了身姿,好像在向人们点头微笑。车窗右边的大运河上,运输船不紧不慢地负重行驶着,船上的女主人用竹篮装着什么,在船帮用力淘洗着,还没等我看看明白,班车已把这船上的情景远远甩在后面。

1985年秋我买了我这辈子第一辆自行车,上海永久牌的。我找高邮五交化公司一位熟人买的,骑车回川青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从邮兴公路向东向北走张轩、周山、营南就到川青了,还有一条路就是从泰山庙向北走淮江公路直至界首向东到临泽、川青。我心想,走张轩、周山那条路,还不如走运河堤边的淮江公路呢,路不仅好走,还有风景看。一路上骑骑歇歇,还记得有一段我骑得很慢,那是马棚湾清水潭一带,运河堤外成片的池杉林高耸入云。

刚走上社会那会儿,对运河的感情是很单纯朴素的,朴素到有时

自己想想都觉得好笑。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川青开往高邮的农公班车大都走周山向南张轩线,有时张轩、龙奔那边的路桥会维修,班车只能从吴堡、六安闸那条路走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个福音,又可以看见运河的风景了。记得1987年高邮文联“珠湖金秋”征文,我写了一首小诗《运河情》,还获得三等奖呢。就是那段时间经常坐汽车在运河堤上行走,一时偶感写成的。

也是在那些年月,改革开放使小城的基础建设加快了步伐。我的连襟夫妻俩看到了小城建设带来的商机,买了六十吨水泥船搞起了运输,装运砂石服务于小城的建筑工地,每次都把船停在南门外的运河边。再后来生意慢慢做大,就在南门一带租了码头,雇了几辆车直接往工地上送石子和黄砂。他们当年的住处我去过,就在小城运河堤下。连襟有时带我去南门外一家饭店吃早茶,沿途的鱼市嘈杂和热闹一直记忆犹新:水盆里泼水逗浪的鲫鱼、吐着泡沫的螃蟹、高邮湖里的白虾,还有运河堤上忙着挤虾仁的大妈嫂子们,空气里尽是高邮湖水浸润过的鱼虾味。

三十年后我和连襟再去小城南门大街闲逛,大街已是另一番繁荣景象,连襟也因为是小城三家颇有点名气的工厂法人而变得沉稳而繁忙,一路上尽是手机响铃声以及和人互相客气的招呼声。

而我自1992年离开家乡,去苏南工作,也分外想念家乡的运河,闲暇之余常常站在异乡的古运河边,看着被轻柔的水波激起的浪花,遥想着家乡运河的宽广和繁忙……

诗中赏荷度炎夏

□夏俊山

对比,借此表达对纯真、自然品格的向往,对美好事物易逝的感慨。

北宋王安石《荷花》诗曰:“亭亭风露拥川坻,天放娇娆岂自知。一舸超然他日事,故应将尔当西施。”诗中“亭亭风露”“天放娇娆”,与西施天生丽质相映照;西施在助越灭吴后,与范蠡泛五湖而去,超然于政治纷争。王安石借荷花言心志。

北宋苏辙《盆池白莲》诗曰:“白莲生淤泥,清浊不相干。道人无室家,心迹两萧然。”白莲的洁净与淤泥的污浊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对白莲的赞美之情,对清浊不分的世事的无奈。

南宋董嗣果《荷花》诗曰:“天机雪锦织绡绡,艳朵亭亭倚画桥。无垢自全君子洁,有姿谁想六郎娇。”诗人先从形象上描绘荷花洁白鲜艳、姿态优美,接着指出君子应像荷花一样保持自身的高尚品德,不受污染,自我保全其纯洁的品性。“六郎娇”指唐张昌宗以姿貌被宠幸,荷花并非如张昌宗靠姿貌取宠,而是有其内在高洁。

清代石涛《荷花》写道:“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碍画船摇;相到熏风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石涛以简练的语言描绘了荷花的娇美与荷塘的宁静。荷叶宽大,荷花娇艳,与画船相映成趣。在熏风四五月份间,荷花还能为人遮挡阳光,增添了几分柔情与温馨。

在诗词的世界里,荷花是美丽的花朵,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文化的传承。炎炎夏日,诗中赏荷,既可以领略荷花的外在之美,又可以感受荷花内在的精神,接受心灵的洗礼。

夏日来临,荷花绽放。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杨万里的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诗写荷花,可追溯到屈原,其名篇《离骚》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诗人以荷叶荷花作衣裳,比喻自己内心高洁,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盛唐诗人王昌龄《采莲曲》曰:“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罗裙与荷叶同色,芙蓉与脸庞相映,歌声起时,方知人在。这种情景交融的描写,既展现了荷花的娇艳,又巧妙地融入了少女的青春活力,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采莲的欢乐氛围。

李白比王昌龄小三岁,他的《古风其二十六》写道:“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秀色粉绝世,馨香谁为传……”首句写荷花生长的环境,展现出荷花的生机与美丽。“秀色粉绝世,馨香谁为传”则表达了荷花的美丽和香气无人传播的遗憾,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自身才华的自信和对知音的渴望。

中唐诗人白居易在《感白莲花》中写道:“白白芙蓉花,本生吴江滨。不与红者杂,色类自区分。谁移尔至此,姑苏白使君。初来苦憔悴,久乃芳氛。”莲花的生活环境变了,品格未变,在坚持中尽显高洁。

稍晚于白居易的陆龟蒙也写了《白莲》:“素蘂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白莲花含着怨恨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谢落,暗喻洁身自好的人总是受到冷落和排挤,只能默默无闻地被埋没掉,表现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怀才不遇。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赠荷花》很有名:“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诗人将荷花与其它花卉进行